



**JG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udies*

**JGSS** Vol. 1, No. 1, 2026, pp. 152-161.

Print ISSN: 3105-1294; Online ISSN: 3105-130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GSS.26.1.14>



## 文学地理学研究历史回顾与前沿探索——梅新林教授访谈录

徐超超 (XU Chaochao), 李莉 (LI Li), 梅新林 (MEI Xinlin)

**摘要:** 本文是对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的访谈。主要内容涉及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路径、当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缘起及概念界定, 梅新林教授结合中西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趋势以及自己的学术经历与创新探索, 回答了建立具有自主创新体系的中国“新文学地理学”的逻辑基点, 西方空间理论对于中国文艺理论的重大影响与借鉴意义, 文学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异同的问题, 指明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论及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路径, 他在访谈中扼要介绍了“总概念—亚概念”的设计逻辑, “三原理论”的建构与发展脉络, “双重空间”“三重模式”的学术理路, 并从批评实践维度阐释了地理信息技术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能运用。访谈结尾, 梅新林教授总结了当前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 内容涉及四大失衡问题, 所主持国家重大社科项目的顶层设计与研究进展,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价值与现实意义等话题。以上问题的探讨将为中外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多元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 文学地理学; 学科定位; 理论建构; 研究路径; 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 徐超超,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学地理学, 电子邮箱为 1120220988@mail.nankai.edu.cn; 李莉 (通讯作者),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电子邮箱为 Li.Li@nankai.edu.cn; 梅新林,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学地理学、红学、中国学术史, 电子邮箱为 mxl@zjut.edu.cn。

**Title:** History and Frontiers of Literary Geography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EI Xinlin

**Abstract:** This 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EI Xinli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hich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1) The origin and defini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2)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3)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f literary geography in China. As for the origin and defini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Professor MEI, 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geography with his own academic experiences and innovative explorations, addressed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establishing a Chinese New Literary Geography with an autonomous and innovative system, the profound influence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spatial theory o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iterary geograph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thereby clarifying the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Received: 09 Sept 2025 / Revised: 13 Apr 2026 / Accepted: 17 May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6.

Regard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h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design logic of “General-sub Concept”,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ree Originals”, the academic framework of “Dual Space” and “Triple Spatial Model”, an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literary research from the critical practice dimension. At the end of interview, Professor MEI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geography concerning four major imbalances,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National Major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gram he directs, and the disciplinary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geography. His insights on the above topics will enrich the scope of researches on literary geography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theory construction; research approaches; future development

**Author Biographies:** XU Chaochao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geography (Email: 1120220988@mail.nankai.edu.cn); LI Li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mail: Li.Li@nankai.edu.cn); MEI Xinl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pecializing in literary geography, Redology, and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Email: mxl@zjut.edu.cn).

##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缘起及概念界说

**徐超超、李莉:** 梅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围绕“文学地理学”,您多年来潜心耕耘,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与专著,请问您是如何在众多文艺理论研究中确定文学地理学这一方向?

**梅新林:**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文学地理学的讨论蔚为大观,与之相关的优秀论著层出不穷。我简单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谈几点原因:

一是从学术渊源看,人类自身及其文化创造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两大要素,时间维度产生了历史学,而空间维度则关注地理学,共同构成了所有学科之母题。西汉司马迁论其发愤著述《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是强调时空交融中的学术创新。只是后来的史家多偏向于“通古今之变”的时间维度而淡化或忽视了“究天人之际”的空间维度。而承续“历史”母学科而来的文学史研究也多是如此,即往往纠结于“时间”主线,而缺乏对于“空间”的敏感性,所以需要回归本源予以反拨与矫正。

二是从学术新潮看,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质疑与反思传统线性进步史观的“空间转向”思潮席卷西方文化思想界,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也许就是1967年福柯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提出的“当今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的著名论断。这一“空间转向”的重大学术变革,不仅深刻改变了西方学界对空间的传统认识和理解方式,同时也有力促进了西方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的重构,并通过相关论著的译介直接影响到国内学者的空间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

三是从学术理路看,鉴于中国文学史研究长久以来存在时空偏失的问题,那么“怎样重构中国文学史”成了一直困扰国内学者的时代话题。实际上,早在1912年底至次年初王国维先生著述《宋元戏曲史》时即已专门设立“元剧之时地”,并前瞻性地使用了地理统计方法。再至1947年,陈寅恪先生进而在《长恨歌笺证》(《元白诗笺证稿》之一)一文中提出了文学史研究应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两大要素之观点,但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既往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关注历史维度的演变进程,而普遍忽略了空间维度的意义探索,于是由“重写文学史”的讨论进而引发了对于重构文学史模式的思考与矫正。到了本世纪初,杨义先生归结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新学术命题,直接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可以说,这股热潮不断开拓着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空间性研究的深度、广度与精度。

四是从学术经历看,地理空间可以说是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学术论题,也是我对于自身学术定位的优先选择。沿海地区的成长环境赋予我对于地理空间的敏锐感知,这一点可以见诸于我早期发表的《海洋母题与中国文学》(1989)一文。在此要特别感谢陈正祥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地理》(1983)对我的深刻影响,不仅是对作者所提的“中国文化中心三次南迁波澜”尤感震撼,而且“用图说话,图文互证”的写作方法也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之后构思“文学地理学”提供了研究基础。严格来说,我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问题思考并不是一蹴而就。我首先将研究视域放置于“中国仙话”与“红楼梦”的文学空间之中,先后出版与发表了《仙话——神人之间的魔幻世界》(1992)《〈红楼梦〉神话新解》(1992)等。然后从2001年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6),再到《文学地理学原理(上、下)》(2017)理论专著的出版,其间又经历了系统思考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漫长过程。

就我个人而言,选择“文学地理学”一方面缘于学术渊源、学术变革以及先辈经验等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则凝结了我本人长期的思考与探索。可以说,空间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范式与方法共同给予了我对于“文学地理学”的深切感悟与激励。

**徐超超、李莉:**您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浑涵兼容,成一家之言,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历史性的追溯,又有对于西方空间研究全局性的把握,真正做到了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的有机结合。我们注意到您不仅精心提炼了“新文学地理学”这一核心理念,而且明确提出构建中国“新文学地理学”的自主创新体系。您认为西方空间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具有哪些借鉴意义?

**梅新林:**我认为了解并且掌握西方空间研究对于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意义重大,不可或缺。

一是从文学地理学正式诞生的维度而言,我们需要锚定一个概念原点——“文学地理学”并非中国学者的概念首创,且在国内外的空间研究史中源远流长。讨论文学地理学,我们绕不开两位重要的法国学者以及他们各自的学术专著,即奥古斯特·迪布依(Auguste Dupouy)《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和安德烈·费雷(André Ferré)《文学地理学》(1946)。两书的相同之处在于共同聚焦法国历史悠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传统,其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也具有共通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着眼于法国区域文学研究,通过行政单位的区隔具体讨论地理环境与作家分布之间的关联问题;后者显然跳出了区域研究的实证探索,转而进入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思考。此外,费雷在《文学地理学》中对于文学概念、文学地图的精心提炼与巧妙设计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例如,费雷将“文学朝圣”视为文学家基于故乡空间或者著名景观进行的文本创作,可以引为阐释我国王勃《滕王阁序》、范仲淹《岳阳楼记》等创作意图与精神磁场提供重要参照。随着翻译工作的推进与完善,中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优秀的空间研究论著。鉴此,我们在坚持构建自主创新体系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前提下,可以从西方空间研究历史语境中找到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学术理念与研究线索。

二是从文学地理学理论创新的角度而言,西方空间研究学者的“地理批评”理论尤具学术借鉴意义。“地理批评”理论的开创者是法国贝尔唐·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与美国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的经典之作是《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La Géocritique: Réel, fiction, espace*, 2007),此书提出“空时性”“越界性”“指涉性”三个重要概念,对于“地理批评”理论具有奠基意义。2011年,美国学者塔利率先英译了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同年,塔利承麦克米伦出版社之邀主编《地理批评探索》(*Geocritical Explorations: Space, Place, and Mapping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2011),其中汇集了一系列美国地理批评的代表性成果,影响深远。在这个阶段,韦斯特法尔与塔利两个人在地理批评的概念、源流、意义等问题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值得关注的是,塔利之后推出了《空间性》(*Spatiality*, 2013)、《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空间、再现与世界体系》(*Utopi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pac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2013)、《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Topophob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2019)等,这些论著围绕文学空间展开,以文学空间理论、制图理论、处所理论为核心,充分显示了塔利在“地理批评”理论上的独特思考与创新转向。在理论应然走向研究实然的过程之中,塔利的“文学制图”与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所倡“文学地图”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彼此在文学地图理念以及实践探索中的虚实不同取向都对文学地图批评多有启示意义。有鉴于此,我们

发现不同国家空间研究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借鉴互证以及观点碰撞都可以成为各自学术研究新的生发点与增长点。

三是从文学地理学研究范式的角度而言，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 1998) 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一是莫雷蒂始终将文学文本内部视作文学地图的研究起点，将小说呈现人物、物体、动作、事件等一系列叙事元素视为地图绘制内容，并以此为基去观察地理空间施加于小说的力量，而狄更斯的《双城记》不仅成为莫雷蒂进行文学地图实践的最佳范本，而且是从文学作品“双城记”臻于文学地图“双城记”并由此引出“第三方”理论的“催化剂”。其二是莫雷蒂(1998)有关文学地图的学理思考与探索，包括文学地图定位、制作、功能、阐释等诸多方面，比如可以“先选择文本特征入手(此处为起点和终点)，找出相关数据，把它们放到纸上，然后观看地图”(p. 13)，这些的确是文学地图研究与制作的经验之谈。其三是莫雷蒂对于文学地图的精心选择与制作。此书正文共计 197 页，却配置了 91 幅地图，真正做到了“地图致思”的思考路径，堪称为文学地图尤其是文本空间地图的经典之作。在我看来，《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的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目前国内对于文学空间地图实践的不足之处，所以强烈推荐大家一读。

以上三个维度的根本归结点，即是基于“地理学—新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新文学地理学”的学理逻辑，提出“新文学地理学”的核心理念，然后构建具有自主创新体系的中国“新文学地理学”。

**徐超超、李莉：**目前国内对于文学地理学的讨论仍然纷繁复杂，一个根本争论点在于文学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的相互关系。您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梅新林：**文学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我认为应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和定位：一方面，文学地理学可以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文化”与“文学”的概念范围并不一致，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此逻辑，视文学地理学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并无异议。例如，英国新文化地理学学者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作品《文化地理学》(1998)中将第四章冠以“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创作与地理”，围绕文本创作、文学景观与表征系统展开讨论，其章节架构逻辑便建立在文学隶属文化的推断之上。就发展脉络而言，文化地理学主要经历了 20 世纪初期的传统文化地理学到八十年代后的新文化地理学的演变，从传统文化地理学的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和文化景观五大领域，到新文化地理学的重点关注文化景观与隐喻意义的研究，都对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参照与启示意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国内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往往并不重视文学地理学的相关价值，根本原因缘于文化地理学界的思维惯性以及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外溢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文学地理学应该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型交叉学科或综合性学科。文学地理学虽然后缀以“学”字，却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门类，国内学界对此纷纷发表意见，大致分为文学本位、地理本位与双重属性三种不同取向与定位。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之中，我(2006)尝试对“文学地理学”进行学科定位，提出应该“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p. 6)。这一论点统摄五个重要理念：1. 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2. 文学与地理学的有机交融；3. 文学本位；4. 文学空间形态为研究重点；5. 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尽管相互关联，但具有各自独立的发展脉络和论证路径，彼此在学科定位、研究内容以及研究重点等方面差异显著，因而不能简单地移植文化地理学概念进行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举例来说，伯克利学派指出文化地理学的五个重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以及文化景观。那么我们能否认为“文学生态学”“文学源地”“文学扩散”“文学区”与“文学景观”便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重点与方向？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广泛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体系之中，文学文本始终占据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位置，并综合运用科学研究方法与审美批评方法，最终完成对于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的描述、分析与阐释。显然，对于文学阐释方法的继承与运用

是文学地理学的独特策略，是区别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本质属性。

总而言之，文化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既具共性又各有个性，关键在于明晰各自的学科定位、发展脉络与论证路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推动两个学科门类的长足发展。

### 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路径

**徐超超、李莉：**中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史源远流长、各具特色。具体来看，法国学者米歇尔·柯罗（Michel Collot）将“文学地理学”系统划分为“文学地理学（狭义）”“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三个亚概念，您则是以“文学地理学”为统摄，划分出“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和“地理诗学”四个核心概念，首次将“地图批评”提升至与其他三者平行的重要地位，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梅新林：**2009年，米歇尔·柯罗曾应北师大之邀作“文学地理学”相关学术讲座。继之2015年，我曾赴法国利摩日大学和巴黎第三大学分别拜访了韦斯特法尔与柯罗教授，其间就“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地理诗学”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由此对相关理论的概念、源流、意义以及前景等问题获得了新的认知与理解。结合姜丹丹所译米歇尔·柯罗的学术讲座《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2014）以及颜红菲的阐释文章《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2014）等，我脑海中逐步有了文学地理学“总概念—亚概念”复合系统的雏形。第一，柯罗第一层面的“文学地理学”侧重于作家的地理分布以及文学活动地理空间，其内核与“地域批评”一致。第二，“地理批评”主要关注文学文本，关注作家如何通过文本空间实践来传达对于世界的理解。第三，鉴于世纪之交中西文学图志、文学制图、文学地图理论与实践的勃兴，尤有必要提出“地图批评”概念，贯通地域批评（外层空间）与地理批评（内层空间），激发出“图一文”合力、互释、互证的独特价值。第四，“地理诗学”则是“从学理角度研究文学地理学的概念、范畴、方法，建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批评实践提供规范与指导”（颜红菲，2014，p. 115）。

关于“地图批评”的重要价值主要可以从以下多重维度加以探究：一是正如“地图”是地理的“第二语言”一样，文学地图也将担当文学地理学“第二语言”的重要角色，应充分发挥相应的重要功能。二是地图历史源远流长，先于文字而诞生。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认为汉字“圖”就是指地图。古老经典《山海经》也是图文一体化。三是中国具有“左图右史”、图文互渗的悠久传统。历代积累的海量地方志都配有地图，而且多以“图志”为名，其中“图”指的是地图、图画；“志”意为记录、记载。因此，“图志”意指富有地图的地志书，是古代地理学与方志学的一种重要载体。杨义先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力图激活本土“图志学”，并推动“地理图志”向“文学图志”的转变，指向以“地图、图片、图解或图式的形式展开文学叙述”的文学作品（梅新林、葛永海，2017，p. 217）。四是“地图批评”契合西方“文学制图”与“文学地图”的研究思潮。以罗伯特·塔利为代表的“文学制图”学派认为叙事或者讲故事是一种制图方式，是人类赋予世界意义的基本方式，因此地理批评家应特别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实践；以弗朗科·莫雷蒂与埃里克·布尔逊（Eric Bulson）为代表人物的“文学地图”学派则提出地理批评家应该运用结构主义研究方法，通过总结文学地理现象输出可视化地图。此外，“文学地图学”“诗性地图学”“生态地图学”等新提法也值得关注。五是从地域批评、到地理批评再到地图批评，三者合一更为完整，彼此相辅相成，相互发明、相互增值。正如我之前所述，按照“内层空间”与“外层空间”之“双重空间”的划分，“地域批评”侧重于文学地理学的外层空间研究，“地理批评”侧重于内层空间研究，而地图批评则力图将双重空间贯通起来，融为一体，进而探索和建构彼此的“图一文”互相阐释系统。由此可见“地图批评”在复合概念中不可或缺。这是柯罗“文学地理学”概念系统中的一个缺失之处，也印证了“地图批评”的枢纽性与兼容性。六是“地图批评”符合“读图时代”的阅读需求。不难发现，图像在现当代阅读语境之中已经部分取代文字，占据了读者的视野。彼此构成互文关系，文字阐释了图像内涵，而图像增强了文字的视觉张力。如果说图像已经变为读者的阅读偏好，那么“图像批评”也自然成了内蕴其中的阅读取向。

**徐超超、李莉：**您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之中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术语与研究理论，其中“三原”

理论尤为关键。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理论，并着重谈谈加入“精神探原”（第三原）的原因？

**梅新林：**“文学地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概念界定、学科定位、理论建构、方法创新四个层面，其核心在于理论建构。鉴此，我重点凝练并提出了“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追溯起来，“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的“二原”理论最初出现在我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中，是基于文学地理学“注重现象研究，缺少理论建构”困境的一次突围。严格来说，“版图复原”致力于宏观层面上文学空间的整体描摹与呈现，“场景还原”则侧重于探索微观层面上作家之于空间的个体创造，两者交融贯通，互为补充。

在此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二原”理论的未尽之处，即“空间研究的终极意义为何”“怎样进行文本意义的探寻与追问”，“精神探原”由此诞生，“二原”理论进一步扩容为“三原”理论，即“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依次递升与有机统一。这一构想一方面是得益于自己对于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持续思考与探索。其实回想起来，“精神探原”原本蕴含在“场景还原”之中，因为我在《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所论“场景还原”时即已强调指出：所谓“场景还原”说，既是对一种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归。另外，同书还曾提出“精神磁场”这一概念，主要是指某一特定地域因为巨大的精神向心力而吸引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文人群体纷纷汇聚于此。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唐开元四年（716年）张说被贬岳州刺史后，在岳阳城西门临湖修建了南楼，即后来的岳阳楼。当时张说常与文人登楼吟咏，蔚为风气之后，唐代流贬文人张九龄、王昌龄、贾至、刘长卿、张渭、顾况、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纷纷吟诗作文。至北宋，滕宗谅贬岳州知府，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为作《岳阳楼记》，于是岳阳楼即成为“迁客骚人”荟萃吟咏之所。加之屈原、贾谊流贬附近的地缘因素，又进一步强化了岳阳楼的“精神磁场”效应。当然，历史地看，岳阳楼仅仅是众多流贬文人荟萃之地中的代表而已，在历代各重要流贬之地中都会有如岳阳楼那样的精神磁场出现。此后我还曾一再思考文学地理学的“价值内化”与“意义重释”的问题。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诸如《红楼梦》的“金陵”之“价值内化”为“金陵情结”，鲁迅先生的系列“故乡”小说之“价值内化”为“故乡情结”等等（梅新林，2006，p. 6）。所谓“意义重释”，即是透过种种文学现象直趋精神内核，着力探寻文学本原的生命形态，重新发掘和阐释文学世界的深层意义。可以说，上述有关“精神磁场”“价值内化”“意义重释”等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实际上已为第三“原”——“精神探原”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受到美国地理学家杰弗里·马丁（Geoffrey Martin）与弗朗科·莫雷蒂的相关著述的启发。根据马丁（2008）所著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中的归纳，地理学所要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pp. 2-7）。首先，“它在哪里”指向空间定位；处于中间环节的“它是什么样的”涉及空间形态的呈现，代表着从空间定位到意义追寻的思考过程；而“它意味着什么”则表明了空间研究的意义追问与终极指向。三大核心问题依次递进而又相辅相成，这种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富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根据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中所提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重要概念，又分别提炼出“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双重空间”理论，彼此由外而内，内外贯通，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地理空间。于是，基于文学地理学理论创新与建构的内在需要，借鉴马丁“三个核心问题”和提炼莫雷蒂的“双重空间”理论，终于至《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一文完成了“三原论”的理论重构，并成为《文学地理学原理》的核心理论。后来，此书与《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都曾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理论创新是任何学科建设的灵魂，而问题导向则是理论创新的方向与动力。从“二原论”到“三原论”的理论重构，不仅是对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本身的自我升华，而且可以对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作出更有效的回答。“三原论”的内在学理逻辑是：“版图复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分别对应“外层空间”与“空间中的文学”概念。这一维度属于真实的历史空间，是“内层空间”与

“文学中的空间”的根基；“场景还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双向互观，其实践意义在于将“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贯通起来，达成形式研究与意义阐释的链接；“精神探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意义追问，与“内层空间”“文学中的空间”相契合，标志着文学地理学理论的终极指向，具有开放性、深邃性与永续性的特点。

**徐超超、李莉：**您在《论“地图批评”的双重趋势与突破方向》中指明：“地域批评侧重于外层空间研究，地理批评侧重于内层空间研究，而地图批评则力图将二者融为一体”，“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具体指向何种类型？是否与《原理》中的客体空间、主体空间、文本空间以及传受空间相互关联？

**梅新林：**鉴于“文学地理学”概念界说的复杂性，且论题所括对象、内容、外延、边界相关争论不断，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双重空间”“三重模式”的空间研究理路，旨在探索和建构空间阐释学的新型范式与路径，同时也囊括了你问题中所涉及一系列原型空间。

所谓“双重空间”空间指的就是将莫雷蒂的“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提炼为“外层空间—内层空间”的双重空间范式。莫雷蒂（1998）在《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一作中指出：

“文学地理学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是‘文学中的空间’研究，又或者是‘空间中的文学’研究。在第一种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虚构的东西：巴尔扎克想象中的巴黎、非洲的殖民恋情、奥斯汀对英国的重构等；第二种情况，它是真实的历史空间：维多利亚时代大不列颠的省级图书馆，或者是《堂·吉珂德》或《布登波洛克家族》在欧洲的传播。以上两种空间可能偶尔有趣地重叠，但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p. 3）

据此，我们可以更为简洁地提炼为文学地理学中的“内层空间”与“外层空间”。前者重点指向自成一体的文学文本空间，后者则兼容文人籍贯地理空间、文学活动地理空间以及传播地理空间。

所谓“三重模式”，意指以“双重空间”为基轴，进而系统建构“外层空间—内层空间”“叙事空间—隐喻空间”“文本空间—图本空间”相互交融的空间阐释学新型范式。第一维度“内层空间”的“双层空间”的区分与交融，除了比较科学而有效地回答了“文学地理学”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双重属性及其内在逻辑关系问题之外，也同样可以为重构新的“空间阐释学”体系奠定整体学术基架。第二维度是“叙事空间—隐喻空间”的相互交融。与上述“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第一维度有所不同，“叙事空间”与“隐喻空间”的相互交融，旨在透过文学空间形式而深入其内在的因果关系，即可进而揭示蕴含于其中的各种隐喻意义。第三维度是“文本空间—图本空间”的相互交融。由“文本空间”拓展至“图本空间”，以及“文本空间”与“图本空间”的互构性与互文性，对于文学地理空间而言无疑具有开拓性与可视化的双重意义，同时也是对上述“内层空间—外层空间”“叙事空间—隐喻空间”相互交融的两个维度的有力呼应与升华。在此，除了重点关注图文之间的互释功能与效应之外，还要高度重视引入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学地图制作，以走向数字文学地图以及图文互文效应实现对传统文学地图的突破与超越。

通过“双重空间”“三重模式”的空间阐释学新型范式的建构，文学地理学可以更有效地形成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具象研究与抽象研究相结合、文本研究与图像研究相结合的空间研究路径。

**徐超超、李莉：**在《论文学地图》《论“地图批评”的双重趋势与突破方向》等雄文中，您以“借喻性地图”与“实体性地图”进行类型分野，预见性地指出两者相互结合或是未来地图批评的学术发展方向。结合时下火热的地理信息技术，您认为这些技术手段能否为两类地图的携手发展提供新助力？

**梅新林：**本世纪初，杨义先生率先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重要命题，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探索。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已有的学术成果多将研究对象集中于文学文本之中的借喻性地图，鲜有对文学地图本身诸多论题进行回应，忽视了学理上的历史分析与逻辑建构。鉴于此，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发表了《论文学地图》一文，首先为“文学地图”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文学地图’是移植和借鉴‘地图’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跨学科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旨在以‘图—文’两大叙述语言系统的有机融合呈现和揭示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意义，具有相对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广而言之，‘文学地图’兼有‘实体性’与‘借

喻性’两种取向和类型，可以分别归之于‘狭义’与‘广义’的文学地图”（p. 163）。然后集中探讨了“文学地图”形态演变、时空逻辑、图文结构、二元方法以及互文功能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无论是偏向文本意义阐释的“借喻性地图”，还是注重图文结构的“实体性地图”，它们都不同程度上移植和借鉴“地图”思维、理论、方法、技术与载体，具有相对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揭示出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意义，因此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文学地图实践长期处于彼此分离，双向发展的研究现状。“实体性地图”具备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而“借喻性地图”则是文学地图的一种变体，往往有文无图。相应的，从事“实体性地图”的文学研究者表现出对于制图技术与制图方法的热情，缺乏对于作品审美价值与作者创作理念的阐释能力；而从事“借喻性地图”的学者认为文学制图就是指作家叙事与写作的过程，所以排斥实体性地图。但正如 R.V.诺伊（Rick Van Noy, 2003）在《勘测内部：文学绘图者与地方感》所论：“只有当叙事和空间同行、文本与地图共处时，对空间的形象描述才有意义，一些普遍认同的符号才有价值”（p. 177）。两类文学地图作为鸟之双翼，不仅不可偏废，而且彼此的相互融合才能发挥文学地图的最佳效能，而地理信息技术恰是提供融合路径的一种优质选择。

拿地理信息系统（GIS）来看，浙江大学开发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即是一个颇为成功的例证。尽管塔利教授（2020）曾对这方面的探索深表担忧：

“地理信息系统与任何新技术一样，它既有令人期待的可能性，同时又有令人担忧的理由……比如在浙江大学看到他们做了一个‘学术地图发布平台’，上面可以看到汤显祖的行迹图，点进去甚至还能看到视频版的《牡丹亭》，它把许多信息整合在一起，做得很好。但我也担心，人们对科技如此着迷，以至于忽略了它所服务的‘人文学科’”（p. 148）。

但“学术地图发布平台”本身功能的不断升级及其赋能效应的快速提升，已为文学地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文学制图的专业性，我们必须承认文学信息与地理学技术深度融合的难度，因而平台的开发并非简单解决如何客观呈现文学空间的成像问题，更可藉此延伸至作家行迹图，作品写作地点分布图等新的文学空间，发掘出基于实体性地图本身而臻于文学新空间、学术新论题的深层价值。再拿虚拟仿真系统（VR）来看，浙江工业大学南宋古都研究院正致力于临安古都的空间复原与景观重建工作：团队首先广泛收集文献资料、地方志与文学作品，依托人工智能与地理信息技术开发临安古都虚拟仿真系统，最终目标是实现南宋临安古都实体空间与历史景观的数字化复原，既能为游客提供可观、可游、可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也能为历史研究者提供可查阅、可考证、可分析、可复原的开放性研究平台。

正如我前面所分析，地理信息技术在文献处理、跨学科、跨语言、跨媒介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已经形成的地图还可根据数据平台的变化做到实时更新，帮助文学研究者还原、反思和建构新的文学空间，既强调身临其境之感，又追求超越现实的理解。

## 当前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趋势

**徐超超、李莉：**感谢您的精彩分享！总体而言，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颇丰，但仍有不少学者提出当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存在不足，缺乏理论建设与学术高度。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梅新林：**在对文学地理学进行理论建构与批评研究的过程中，数字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为文学研究带来了便捷方法，另一方面也让人们陷入文学功能的焦虑之中。我认为尽管当前学界反响热烈，新见迭出，但仍然存在“四大失衡”问题需要给予关注与纠正。第一，虚实失衡。无论是关注人物活动轨迹的空间呈现，还是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空间分析，都重在基于文学现象进行的案例实证类研究，而面向文学地理学自身的理论探索与方法创新的成果不显著。第二，内外失衡。“外层”空间研究注重文献材料和数据统计，更受欢迎；而“内层”空间研究则需要全面把握文学文本，细致还原文学空间图像，难度颇大。结果导致重此轻彼的失衡。第三，古今失衡。这是指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偏重于古代经典文学文本，而相对忽略了现代文学的空间研究价值。事实上，诞生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文学作品

往往表现出对于空间性与流动性更强的感受力，因而具备了更高的研究价值。第四，中外失衡。如何对待和处理本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关系，同时存在着主观认知与客观条件的双重制约。前者很大程度上缘于有关文学地理学“地方性”的视野局限乃至认知误区，于是“在地言地”或许是最简单、最可考的选择，后者则对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的文化背景、专业知识与语言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横亘于众多学者面前的一道难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本土走向比较文学地理研究势在必行，而应对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能力要求，任何学术个体都无法独立承担，唯有通过团队集体的协同攻关方能完成。

**徐超超、李莉：**中国文学地理学泽披深远，影响广大。相信成功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将是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祝贺您再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地理学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该项目将从哪些方面开展研究。

**梅新林：**衷心感谢学界对于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关注与支持！作为第一个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它兼具基础理论与跨学科的双重属性，围绕“中国文学地理学为何”“中国文学地理学何为”“中国文学地理学如何为”三大核心问题，寄望建构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自主创新体系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目前，我带领团队已经全面展开了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研究，敬请感兴趣的学者予以关注和支持。

从本项目定位看，“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处于研究核心位置。考虑到古代文学地理学文献的海量积累以及整理的难度，本项目的基础工作即是首先对于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学地理学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与整理，然后在“古今通鉴”“中西通鉴”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前者意指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古今贯通研究，致力于撰写第一部中国通代文学地理学研究史著作；后者意指中西文学地理学的比较研究，致力于撰写第一部中西文学地理学比较研究的著作，最后完成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建构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自主创新体系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

从项目阶段性成果看，本课题已于2025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西方文学地理空间研究译丛”第一批6本译著，预计将完成30部以上外国著作的译介。该套译丛定位清晰、辐射广泛、内容丰富，希望能为国内对文学地理学感兴趣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灵感来源与启示意义，并在文明互鉴过程之中推动文学地理学的长足发展。

**徐超超、李莉：**我注意到您所提的“三大核心问题”意在观照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现实意义？

**梅新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学科体系建构离不开学术价值的现实转化，文学地理学也不例外。

首先，文学地理学可以赋能于中国文化地理资源发掘，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力量。文学地理是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不同的文化精神会塑造不同的文学地理景观，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相互促进。围绕空间研究、地域文化与地理要素的文学地理学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一条全新的进路。

其次，文学地理学可以赋能于绘制文学传播地图，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莫雷蒂的《欧洲小说地图集》曾就文学传播作了实证性研究，并据此绘制出文学传播地图。就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谱系而言，文学传播地理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将来可以进一步发展为“文学传播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鉴于目前的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海外研究多为文字表述，普遍缺少立体的、动态的、虚拟的传播地图支撑，则数字时代的地理信息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绘制出内容更丰富、信息更完善、形式更多样、效果更显著的文学传播地图，借助文学传播地图来推动文化交流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最后，文学地理学可以赋能于文旅空间规划，赋能文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追根溯源，现代文学地图原型之一来自于英国早期的一批旅游指南，通过在指南中插入文学典故以吸引和满足有文学品味的旅行者，从而把现实和想象的世界联系起来而赋予其“文学朝圣”的精神意义。随着文学地图的智能化发展，不仅可以通过中国文学地理的版图复原研究直接服务并优化文旅空间规划，包括文旅空间整体规划、重点区域板块规划、文化诗路带、文学景观遗产规划等等，提升旅游线路以及目的地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而且可以通过地理数字图像系统建设，更形象、更直观、更智能地为文旅产业赋能。

总之，文旅空间的核心议题都在于平衡好文学文化的精神能量，历史遗产的物质力量以及地理系统的技术质量，进而打造出具有“精神磁场”吸引力的文旅产品，最终促进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徐超超、李莉：**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分享文学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心得，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指导！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项目编号：16ZDA19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XU Chaochao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8-8650-9030>

LI L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0-0002-1261-6051>

MEI Xinlin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8-4514-3749>

## References

- 马丁（2008）：《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4版），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Martin, Geoffrey J. (2008).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CHENG Yinong, & WANG Xuemei, Trans.; 4th ed.).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梅新林（2006年6月1日）：“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  
[MEI, Xinlin (2006, June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ry Ge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News*. <https://image.chinawriter.com.cn/2009-06-18/UFb10560237001245336895.pdf>]
- 梅新林（2015）：“论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08）：159-181+207-208。  
[MEI, Xinlin (2015). Literary mappi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8), 159-181+207-208.]
- 梅新林、葛永海（2017）：《文学地理学原理》（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MEI, Xinlin, & GE Yonghai (2017). *Principl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Vols. 1-2).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Moretti, Franco (1998). *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 -1900*. Verso.
- Van Noy, Rick (2003). *Surveying the interior: Literary cartographers and the sense of place*.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颜红菲（2014）：“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67（06）：112-117。  
[YAN, Hongfei (2014). A review on western literature geography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67(6), 112-117. <https://doi.org/10.14086/j.cnki.wujhs.2014.06.015>]
- 朱立元、陆扬、塔利（2020）：“关于空间理论和地理批评三人谈——朱立元、陆扬与罗伯特·塔利教授的对话”，《学术研究》（01）：143-148。  
[ZHU, Liyuan, LU Yang, & Robert T. Tally Jr. (2020). A triologue on space theory and geo-criticism: Conversation between Zhu Liyuan, Lu Yang and Robert Tally. *Academic Research*, (1), 143-14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20.01.018>]

（校对编辑：袁若冰 张平）